



大会

Distr.
GENERAL

A/HRC/10/31/Add.3
16 January 200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和
世界人权会议后续行动

增 编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和第 20 条之间的
联系问题专家研讨会：“表达自由与构成煽动歧视、
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
(日内瓦，2008 年 10 月 2-3 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 **

* 本报告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本报告的附件仅以所收到的提交件原文分发。

** 提交迟了。

内容提要

表达自由与仇恨演说、特别是与宗教问题有关的仇恨演说之间的分界线问题最近在国际一级开展了讨论。为对这一辩论有所贡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召集了一次专家会议，讨论在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情况下的表达自由问题。

专家研讨会于 2008 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在日内瓦举行，包括来自政府、联合国机构、区域组织、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 12 位专家和 200 多位观察员参加。

研讨会上主要讨论了四个议题：

- (a) 与其他类型“煽动”的类似之处和可比之处(第一部分)；
- (b) 对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这一概念的分析(第二部分)；
- (c) 限制表达自由的限度：标准和应用(第三部分)；
- (d) 国际法律框架和公约第 19 和 20 条和国家的义务之间的相互联系(第四部分)；

研讨会最后，专家们简单总结了他们的主要意见并对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谈了看法(见第五部分)。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7	4
一、国际法律框架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19 和 20 条和国家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8 - 22	6
A. 专家发言	8 - 17	6
B. 专家讨论情况	18 - 19	9
C. 一般性讨论情况	20 - 22	9
二、限制表达自由的限度：标准与应用	23 - 34	10
A. 专家发言	23 - 28	10
B. 专家讨论情况	29 - 31	11
C. 专家讨论和一般性讨论情况	32 - 34	12
三、对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		
仇恨这一概念的分析	35 - 44	13
A. 专家发言	35 - 43	13
B. 专家讨论和一般性讨论情况	44	15
四、与其他类型“煽动”的类似之处和可比之处	45 - 59	16
A. 专家发言	45 - 54	16
B. 专家讨论情况	55 - 56	18
C. 一般性讨论情况	57 - 59	18
五、会议结束	60 - 72	19

附 件

List of experts and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21
--	----

导 言

1. 鉴于一系列与表达自由相关的事件在继续分化社会，而关于表达自由与仇恨演说、特别是与宗教问题相关的仇恨演说之间的分界线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决定召集一次专家会议，讨论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和 20 条框架内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情况下的表达自由问题。专家研讨会的目的有两个：解决“诽谤宗教”概念背后的潜在人权关切问题，提出一种以人权法为依据的做法；确保对公约第 19 条和 20 条作正确的法律解释。专家研讨会的任务是探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和对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的强制性禁止问题，来作为保护个人和群体的一种手段。因此，研讨会应就如何在越来越文化多元化的社会中处理这些问题提供指导，并介绍最佳做法和立法和司法实践比较。进行的方法是着重从人权法的角度展开讨论。

2. 专家研讨会于 2008 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在日内瓦举行，包括来自政府、联合国机构、区域组织、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 12 位专家和 200 多位观察员参加。¹

3.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于 2008 年 10 月 2 日宣布专家研讨会开幕，提到了即将到来的世界人权宣言和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六十周年纪念。她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提出表达自由及其限度的条款的历史环境突出了针对煽动歧视和暴力制定各种形式保护的必要性。虽然在国际人权法中存在的仔细界定的限度是无可争辩的，但对其准确的含义和具体应用仍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高专回顾说，在世界许多地方，表达自由不幸仍然是遥远的梦想，那些对任意滥用权力最脆弱的人们(例如，宗教少数)往往被剥夺了这一权利。在没有公开表达自己宗教归属的自由的情况下，奉行宗教传统并将其代代相传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她着重指出，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同样，表达自由对于创造一种环境可对宗教事务进行建设性的、然而有时是批评性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和文化交汇越来越多，表达自由是抵御多样化的敌人的最好防御手段。在国际法中，以及在大多数国家法院的法理原则中，都清楚地规定了一些明确界定的、范围狭窄的类别的演说，如 Mille

¹ 研讨会议程见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agenda.htm。

Collines 电台在卢旺达播放的仇恨演说，可合法地归入违反安全保障限制范围内。高专强调了集中讨论这类极端例子的重要性，但承认在不是这样是非明确的情况下，存在着对条款的解释问题。最好是在对每一种情况作了详尽评估之后再做最后的决定，来划定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演说之间的分界线。这样的决定应始终遵循明确界定的标准和以国际标准为依据。

4. 在结束开场白之后，高专请专家研讨会主席 Bertrand Ramcharan 发言。主席对各位专家和观察员表示欢迎，并请人权理事会主席 Martin Ihoeghian Uhomoibhi 阁下发言。

5. 理事会主席回顾说，最近几年，“诽谤宗教”的问题在理事会被多次提出，是许多决议、报告和研究的主题，并且每次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关切。他承认有必要在理事会之外讨论这个问题，以便在理事会能更恰当地加以处理。在谈到将目前的讨论从“诽谤宗教”转到“煽动宗教仇恨”的法律概念这一建议时，主席注意到，随着普遍同意把重点放在后一个概念，关于本次讨论的总的调子有可能出现观点趋同的积极趋势。他提出了如何在不损害表达自由的情况下与煽动宗教仇恨作斗争，以及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在确保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方面的作用问题。他提到了文明同盟的倡议；最后，他强调指出，为促进在教育等领域的对话，还要采取许多步骤。

6. 主席宣读了联合国文明同盟高级代表 Jorge Sampaio 阁下的致词。成立该同盟是为了通过促进跨宗教和文化鸿沟的合作，避免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的威胁。高级代表指出，政治冲突只能通过政治谈判加以解决，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和平协议如果没有所涉社区的有力支持就很少能够维持。要为可持续的和平创造必要的条件，需要进行不同类型的努力，在分裂的社区之间造成思维的转换。此外，在不同的社区之间的和平共处受到蠢蠢欲动的紧张关系威胁时，这些努力首先就能预防冲突的发展。同盟也肯定了宗教团体在调解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偏见和陈规陋习会加剧文化的分化，因此，加以消除也同样重要。同盟作为一项全球范围的倡议，旨在巩固其在联合国全球议程中的作用，即，文化多样性良好管治的支柱和预防冲突和缔造和平的工具。

7. 在开始第一场专题讨论之前，主席请各位专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简历(见附件)。然后，主席介绍了议题，强调要从人权法的角度进行讨论。由于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公约某些条款的解释问题，他回顾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和补充手段的第 31 和 32 条。

一、国际法律框架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19 和 20 条和国家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A. 专家发言

8. Frank La Rue 就意见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和对这一权利的限制应如何应用的问题作了发言。² 他提到了表达自由的权利被正式承认的来龙去脉，特别强调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情况和隐含的原则，即，只有在每个人的坚持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的共存才能被容纳。他补充说，前头的主要挑战是要承认表达自由是反对独裁主义和独裁的主要机制。

9. La Rue 先生指出，在起草公约的时候，大家很清楚，必须要以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人权。但是，在考虑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时，有必要遵循一些具体的标准：(a) 必须根据法律确定这些限制；(b) 这些限制应关系到保护其他人的权利或公共秩序；(c) 这些限制必须禁止任何基于种族主义、种族或宗教歧视的鼓吹暴力。他争辩说，当今时代有必要在没有来自国家的新闻检查和强加的种种规定的情况下，将表达自由与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斗争统一起来，包括反对儿童色情和煽动仇恨或战争的斗争。

10. La Rue 先生解释说，表达自由的权利可被动地行使，但需要国家做出永久性的承诺。他着重说明了行使这一权利的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对表达自由实行任何限制的前提条件是这一权利的全部内容得到永远的保证。第二，仇恨和暴力的表现形式需要明确的理解和界定。批评的机制，特别是批评政治领导人的机制对于问责领导人很重要。表达自由不是限于被认为是适当的或有利的声明而已；限制须严格限于公约的措辞。关于仇恨演说的定义须清楚地确认煽动必须直接关系到个人或群体。特别是，将国家的象征或主观的价值观作为目标的讲演不可看作是仇恨演说。他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尊重他人的权利。表达自由是文化、文化多样性、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对表达自由的权利以对捍卫这一权利的积极理解来处理很重要。

²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LaRue.doc.

11. 然后, Agnès Callamard 谈了在对付仇恨和仇恨演说中法律的作用和定罪的作用。³ 她解释说,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大环境, 在大多数条约中, 非歧视问题都是个交叉性问题。表达自由在国际人权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来自人们承认: 人类的最大的灾难(包括种族灭绝), 都曾需要对表达、意见和良知进行全面控制。她补充说, 法庭都强调了表达自由不仅本身是一项权利, 也是保护其他权利的行使的基石或增强的权利。

12. Callamard 女士也说, 虽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是基本的, 但它不是绝对的权利。第 19 条下列数的种种限制是任择性的, 不是强制性的。因此, 它们给国家提供了一种理解空间, 即, 在限制这一权利方面它们可以走多远。她建议, 对演说的限制应遵守严格的条件和过三关: (a) 限制必须是法律所规定的; (b) 必须是为了合理的目标; (c) 必须是必要的并与确保这样的一种目标相适称。政府必须强调其对提供平等待遇, 如, 在教育、卫生和住房方面的平等待遇的责任。

13. 关于公约第 20 条, Callamard 女士回顾说, 限制是强制性的; 因此国家责无旁贷, 应对煽动仇恨的对象提供保护。然而, 她指出在成员国对第 20 条应如何执行的解释中存在的很大的差异, 例如, 关于仇恨演说的动机或所使用的媒介问题。特别是, 她回顾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Ross 诉加拿大一案中的意见⁴, 其中, 委员会承认第 19 条和第 20 条应一起读。就此, Callamard 女士得出结论说, 上述条件也应适用于根据第 20 条所实行的限制。

14. Callamard 女士强调说, 将仇恨演说定罪应只是手段之一。此外, 她争辩说, 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仇恨演说的强硬规定结果会带来对平等原则的更好的保护和执行。她强调有必要全面考虑各种选择而不是只是集中在某一项立法选择上。她着重说明了少数媒体作为一种基本要素的重要性, 并提到少数由于被排斥在主流媒体之外而往往没有它们的声音。

15. Nazila Ghanea 继续谈国际法律框架和公约第 19 和 20 条与国家义务的相互关系问题, 特别是国际法就这一问题所提供的保护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家机构

³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Callamard.doc.

⁴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六届会议, 增编 No. 40 (A/56/40) (第 II 卷), 附件 X, F 节。

对此的解释。⁵ 她争辩说，虽然第 19 条没有确立一种绝对的权利，但案例法和文献并没有显示制裁仇恨演说就一定意味着禁止这种表达的发生。国家得说明为什么取消这种表达是必要的理由。

16. 关于第 20 (2)条，Ghanea 女士指出，提及“鼓吹”一词意味着私下演说不可制裁；这里应有公共因素。此外，演说须达到某种程度的严重性才能被禁止。她解释说，这一条件意味着，仇恨演说得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才可被禁止。她指出，歧视与敌意和暴力差别很大，因此，要用不同的门槛。此外，公约的条款也覆盖了歧视，例如，第 26 条。Ghanea 女士争辩说，因此，国家应说明要减轻歧视的害处除禁止被认为是有害的表达之外别无他法。她还争辩说，关于“敌意”和“仇恨”的定义不如“暴力”的定义清晰，后者的定义更加现成。她建议，采用研究历史的来龙去脉的做法，查明什么是可能的“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对一特定种族或种族群体的暴力或迫害的历史可成为说明这一群体的脆弱性的有意义的指标，这说明有必要采取有具体针对性的来龙去脉的做法。就此，她强调，少数人权利的法律框架可能有助于这些讨论，例如，少数民族走上公共岗位的程度，他们在法院中的地位或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程度。关于将“敌意和暴力”并入“暴力”一词的问题，Ghanea 女士指出，需要先表明存在仇恨，然后只有在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情况下才加以禁止，而不是倒过来。

17. Ghanea 女士总结了五条初步结论：(a) 讨论表达自由的限度不能脱离根据整个公约所承担的总体义务，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有的程序和少数人的权利等；(b) 与表达没有合理的联系的随意的或有人指挥的暴力行为不应成为对表达自由加以限制的理由；(c) 在仇恨本身就引起暴力的地方，表明了一种更广泛的暴力模式；启动了第 20 条就表明国家没有能够保证第 26 条所规定的不受歧视的权利；(d) 第 20 条也要求有仔细的分成不同等级的制裁；最低一级，不应侵害表达本身，最高一级，可引发制裁；要小心不要让限制对总的表达自由造成消极影响；(e) 在国家范畴内还需要其他的行动。

⁵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Ghanea.doc.

B. 专家讨论情况

18. 大多数专家认为，法律措施，特别是将仇恨演说定罪，应被看作是处理这种现象可采用的众多政策选择中的一种特定的手段而已。在这方面，教育，包括宗教内和宗教间的教育的作用得到了强调。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将仇恨演说定罪的重要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威慑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禁止仇恨演说不一定会导致根除歧视，那些有非常有力的关于仇恨演说的立法的国家的情况就是明证。讨论了许多选择，包括教育、加强媒体的专业化及其自律能力等。

19. 大多数专家还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表达自由的权利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之间的冲突这一说法不准确，强调所有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会议还提请人们注意要解释或判断文化特殊性和宗教敏感性是很难的。会议还提出有必要重视特定社区的特定环境和脆弱性。

C. 一般性讨论情况

20. 专家讨论后开始了一般性辩论，观察员也发了言。一些国家认为，面对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提供保护是需要的，并着重指出，仇恨演说是针对特定社区的，特别是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是针对穆斯林的。还强调，大多数国家认为，表达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这在人权理事会最近的辩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一个国家建议，应考虑搞一个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以保护人的尊严免受仇恨演说的伤害。

21. 其他一些国家认为，消除宗教仇恨和不容忍需要采取全球性的做法，强调要在对话、教育和多元化领域采取行动。会上还指出，公约第 19 和 20 条构成了防止鼓吹宗教仇恨、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重要的法律框架，国家履行在这方面的义务至关重要。

22. 一些国家还提请注意在解释和评估对诽谤宗教和文化的指控方面的困难。特别是，有人提出某篇演讲是否是诽谤性的应由谁来决定的问题。观察员们肯定有必要保护文化权利和宗教自由，但同时又指出，这些论点可被以保护主义的方式加以利用来压制批评。

二、限制表达自由的限度：标准与应用

A. 专家发言

23. Asma Jahangir 指出，在鼓吹宗教仇恨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情况下，国家有义务采取行动。⁶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前已经存在鼓吹宗教仇恨的现象，包括反对宗教少数和宗教派别之间的鼓吹宗教仇恨现象。她提醒要谨慎，在紧张状况加剧的情况下，不应催促解决问题。每一种情况只能根据其具体情况判断。她还强调，政府手里有数种手段可用来对付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歧视问题，和为辩论降温，例如，通过宗教间和宗教内对话或教育等。

24. Jahangir 女士强调，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暴力行为不应享受任何形式的有罪不罚，在提供法律补救方面司法的作用不可或缺。她提醒要谨慎，对宗教问题不可过度使用立法或含糊的立法，这么做会造成紧张局面，不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她争辩说，国家的角色很微妙，任何旨在打击宗教歧视的立法或政策必须是全面包容的、措词谨慎的，并且平衡地实施才能实现其目标。她补充说，常常以文化的特殊性来破坏妇女的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她设问在卢旺达之所以发生种族灭绝是因为缺乏立法呢还是缺乏行动，不管是司法的还是其他的行动。基本的教训是不要用“我们反对他们”的论调来分裂世界。最后，她指出种族与宗教之间的重要区别，并问道这是否会有任何法律影响。

25. Abdelfattah Amor 提出了一篇论文，主要是针对公约第 19(3)条。⁷ 他论述了表达自由的范围和对其限制的正当方式。他争辩说，第 19(3)条得到第 20 条的强化；但是，存在不肯定的地方，没有清楚的解释。他提到有必要澄清第 19(3)条的条款和应由谁来界定的问题。此外，他争辩说，这些条款包括了个人和群体的责任和义务，这就为国家解释第 19(3)条进行限制打开了大门。

26. Amor 先生强调说，这些责任和义务须符合所期待的目标，以便促进表达自由。他表示第 19(3)条正是提供了限制的根据。但是，不应普遍地实施限制，而是应当有分寸的、作为例外情况和出于必要的，例如，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或道德等。他补充说，“必要”一词的含义受到事情来龙去脉的影响，因

⁶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Jahangir.doc.

⁷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Amor.doc.

国而异，因文化而异。在谈到第 19(3)条下可能的限制范围时，他争辩说，限制不象看上去那样范围深远。

27. Mogens Schmidt 讨论了公约第 19 条，重点是教科文组织的任务：加强互相理解，确保和平，思想、良心和宗教、表达和观点自由。⁸ 他指出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他还指出，新闻检查会破坏民主的基本因素。在这方面，尊重表达自由和尊重宗教信仰和象征是两条不可分割的原则，它们携手才能缔造和平，在各种文化、文明、宗教和人民之间建立对话。

28. Schmidt 先生指出，出于民法或刑法的要求而对新闻自由的任何限制必须符合两个条件：限制须由法律规定，应是为保护若干公共领域以及他人的权利所必要的。还须要明确、严格的界定，必须由独立的机构实施。他还争辩说，限制必须尊重这样的原则，即，没有人会因说了实话而受到惩罚，每人因传播仇恨演说而受到惩罚——除非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意图是要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他补充说，不应用事先审查作为限制辩论空间的手段，应谨慎采取最少的干预性措施尽可能将对表达自由的任何威慑降到最低。最后，他敦促有必要开展能力建设增强民间团体的能力，特别是记者的能力。

B. 专家讨论情况

29.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位专家对普遍存在强调限制的例外性、忽视公约在表达自由与其他权利之间达成小心的平衡的倾向表示关切。特别是，对仇恨演说开展讨论的政治背景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实际意义，特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参加这场讨论的行为者的范围应加以扩大，不仅要涉及法律专家，而且，例如，义务专业人士、政治人物和宗教领袖，都应参加。其他一些专家认为，虽然政治背景是个重要的指标，在人权和法律框架内处理这一问题也很重要。然而，还有一些人对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的“新表现”这一说法提出疑问，说在“9.11”之后强调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其实早就存在。

30. 一些专家提到需要将种族仇恨与宗教仇恨区分开来，着重指出了“种族”概念与“宗教”概念的差别。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任何形式的针对一批人的歧

⁸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Schmidt.doc.

视之间作比较是可能的，如果这些人可清楚地被看出是同一个群体，并因此受到歧视的话。

31. 有几位专家着重指出，对表达自由的限制的门槛很高，如严重的或眼前的威胁或危险等。专家们对如何确定什么是公约第 19(3)条下的“必要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C. 一般性讨论情况

32. 一些观察员认为，由于目前存在着新形式的歧视，有必要提供额外的保护对付煽动宗教仇恨。这一观点引起了其他一些观察员的关切，他们认为没必要对现有的国际准则采取补充标准，因为现有准则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保护来对付仇恨演说。

33. 除了法律措施之外，大家一致认为，采取更广泛的战略，纳入文化交叉的教育、文化间的对话和促进对多样性的容忍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对表达自由的限制应被看作只是对付这种现象的许多选择中的一项而已。

34. 一位观察员主张，限制表达自由以对付煽动宗教仇恨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害”，因为其目的是坚持全面的人权。其他一些观察员指出，使用主观性的、过于笼统的限制会威慑住表达自由，因此，重点仍应放在全面促进这一权利，而不是其可能的限制上。

三、对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 鼓吹宗教仇恨这一概念的分析

A. 专家发言

35. Vitit Muntarbhorn 就用以界定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这一概念的标准做了发言。⁹ 他坚持认为表达自由概念与宗教自由概念之间是有关系的，强调宗教或信仰自由取决于表达自由，“表达”的要素由一个宗教的表现形式而外形化了。这两种自由也都取决于一定程度的容忍、互相尊重和人类存

⁹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Muntabhorn.doc.

在之中固有的多样性，包括不信教者。他接着说，表达自由这个概念与尊重各种各样的意见及其交流方式相联系，并且，这种多元性不应淡化。他解释说，任何对表达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必须考虑到编史工作，这意味着要理解“历史是谁写的，为谁写的”，在这方面不应有对来源的垄断。还应考虑到的是，一个宗教或信仰的创始人可能有非常广阔的胸襟，但后来对该宗教或信仰的诠释却不是那样。

36. Muntarbhorn 先生指出关于“诽谤宗教”的辩论，并强调，在国家一级所用的共同的词是“亵渎”。他着重指出，许多国家有禁止亵渎宗教的法律已经有好几百年了，近几年一些国家改革或废除了这种法律，而另一些国家则继续在用。各种适用的人权条款应合在一起看，要铭记平等和不歧视的交叉原则。他还指出，对宗教和表达的表现形式的限制应是一种例外，而不应成为通例。他补充说预防比治疗好，并强调多元文化和文化间的教育很重要。就联合国范围而言，有必要通过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般性评论的方式对宗教自由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

37. 最后，Muntarbhorn 先生表示，要澄清公约第 20(2)条的内容应考虑到各种参数；特别是，必须承认第 19 条与第 20 条的互相联系。第 20 条也必须完整的看，要考虑到整个人权法，包括应有的程序原则和非贬损权利以及高门槛的所有要素。接近“公共挑衅”概念的“煽动”这个词和不是指“不喜欢”，而是“高度蔑视”的“仇恨”一词尤其是这种情况。在歧视、暴力和敌意诸概念中，后者为更多的解释打开了大门，有“敌人”的意思。此外，根据 Muntarbhorn 先生的看法，第 20 条中的规定性的内容不应导致自动的定罪，虽然他肯定了法律威慑的价值。定罪要求犯罪者要有故意的因素，虽然国际法的演变在这方面要求要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Muntarbhorn 先生还说，根据第 20 条，禁止还意味着问责和反对有罪不罚。

38. 然后，Patrice Meyer-Bisch 谈了他对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这一概念的分析。¹⁰ 他表示，为打击这种行为现在有各种刑事的、民事的和社会的制裁手段。当使用刑法时，对该法进行宣传很重要。制裁不仅要阻止

¹⁰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Meyer-Bisch.doc.

非法行为，而且要修补对相互信任所造成的伤害。他强调教科文组织在 2001 年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在 2005 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并指出，容忍包含着尊重。容忍还意味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自由，因为每一项人权都涉及自由和责任这两个概念。问题不在于限制自由，而是发展其不可分割的实质内容。

39. Meyer-Bisch 先生也主张对人的“尊重的批评”这一概念，同时又主张宗教多样性这一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Meyer-Bisch 先生认为，当文化资源受到攻击的时候，就无法实现文化自由，而批评应总是可能的，条件须是尊重人和所获得的知识，并且立足于真诚的原则。宗教本身就是做诠释的地方，因为无人能断言可对宗教经文作绝对肯定的解释。

40. Meyer-Bisch 先生还强调自由的文化内容。对公约第 19 和 20 条的严格解释并不意味着只应了解这些条款，其他条款也是相关的，例如，公约第 27 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3 至 15 条。表达自由必须结合接触文化遗产和资源问题加以理解。还必须阐明教育和信息这两个孪生权利的文化内容。为此，应考虑到后一个公约的第 15(2)条，该条呼吁采取步骤保护、开发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最后，他呼吁发展国家观察站，以收集关于尊重文化权利和文化多样性的信息，包括宗教和信仰多样性的信息，并建议国家人权机构研究文化权利问题，也许可通过国家监测方案来这么做。

41. Mohamed Saeed M. Eltayeb 就宗教问题批判思想可允许的限制范围作了发言。¹¹ 他提出，主要前提是根据历史来龙去脉、当地条件和政治紧张情况来展开关于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互补性的辩论，而不是把问题作为这两种自由之间固有的冲突提出来。他指出，有必要采取认可这两种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自由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互相依存性原则，而同时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和互补的态度。他又说，宗教或信仰自由并不保护宗教或信仰本身；但这并不是说保护宗教的象征不受污辱和诋毁不属于宗教自由的范围。他认为，对一个宗教的批评、贬低、污辱或嘲讽是否是对信仰者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的侵犯的问题只能通过审查这种行为是否消极地影响到了信仰者的宗教自由的各个方面来确定。

¹¹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Eltayeb.doc.

42. Eltayeb 先生认为，宗教问题批判思想的限制范围的定义必须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至 20 条。虽然确定哪一种表达形式相当于第 20 条规定的要加以禁止的行为是一个要看具体情况的问题，但重要的是要界定总的标准或参数。Eltayeb 先生特别指出有必要将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的演说同不是这种情况的演说区分开来。他又说，保证表达自由和宗教或信仰自由应是对这些自由实施限制的前提条件。在政府引用公约第 20 条时指出滥用的可能性也很重要，该条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少数。第 20 条的广义适用不仅对表达自由，而且对宗教或信仰自由可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诚实的辩论和研究宗教问题方面。最后，在根据第 20 条有效评估与煽动宗教仇恨相关的案子的过程中，司法独立是关键。

43. Eltayeb 先生在结束语中强调，公约第 20 条并不是自身就可以执行的，缔约国须颁布适当的法律。他强调说第 20 条可被用来迫害和压迫宗教少数的借口，并指出，找出替代使用刑法的办法来执行第 20 条也许更加合适。落实人权要求采取不同的战略，法律措施可被看作是广泛战略的一部份。Eltayeb 先生最后说，不需要新的标准，需要的是将现有的标准的诠释加以发展；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不妨再审议一下对于第 20 条的一般性评论。

B. 专家讨论和一般性讨论情况

44. 由于时间关系，对议题三和四的讨论放在研讨会最后进行。

四、与其他类型“煽动”的类似之处和可比之处

A. 专家发言

45. Doudou Diène 在发言中分析了鼓吹种族仇恨与鼓吹宗教仇恨的类似之处，把重点放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潜在政治背景上。¹² 他呼吁将关于表达自由的辩论放在不同文明对话的范畴内。Doudou Diène 先生提到关于仇恨演说讨论发生的思想背景，回顾了有争议的出版关于先哲穆罕默德的漫画问题。他警告不要采取

¹²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Diene.doc.

非黑即白的摩尼教做法，如，人为地将世界区分为表达自由受到保卫的地区和蒙昧、不容忍主宰一切的地区。

46. Diène 先生争辩说，关于表达自由的限度问题的辩论应放在当前的环境中。特别是，他提到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对人权有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的解释，有首先重视表达自由的倾向。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是当前紧张局势的根源。他争辩说，要谈表达自由就不能不分析歧视问题。他指出，一些国家找到了反对歧视的法律战略，但没能解决种族观念和歧视思想状态的根源问题。他争辩说，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于反歧视，而是应当推动各社区之间的互动。这就使民族特性的较多元的概念得以出现，而这是与行使表达自由是密切相关的。

47. Diène 先生也提到了他认为的种族主义的三种趋势：(a) 种族暴力和歧视的高涨，包括反犹太主义和仇视伊斯兰心理同时上升；(b) 民主社会中政治党派对种族主义的政治工具化；(c) 种族主义的科学合法化。至于可能的解决办法，Diène 先生建议，应研究种族、宗教和文化混合在一起的问题。他也呼吁辩论重新回到人权和公约的框架内，特别是关于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概念问题。他认为，如果表达自由的限度得到尊重，表达自由就会得到加强。

48. 然后 Patrick Thornberry 就仇恨演说的形式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做了发言。¹³ 他解释说，公约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是针对纳粹的做法起草在冷战时代和反对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达成的。公约目前有 173 个缔约国，是联大决定将关于种族歧视的法律文书和宗教歧视的法律文书分开起草的结果。

49. Thornberry 先生表示，虽然公约第 1 条中所列歧视的五种理由——种族、肤色、出身、国籍或民族血统——没有点明宗教，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审议个别案例时在种族歧视与宗教歧视之间寻找了“互相交叉”的要素。此外，公约第 5 条提倡不受歧视地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因此，委员会在其结论性意见中多次提到仇视伊斯兰、歧视犹太人和锡克人、歧视土著宗教、亵渎圣地等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感到宗教和种族有着重叠或交叉的情况。

¹³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Thornberry.doc.

50. Thornberry 先生说，公约第 4 条处理的是仇恨演说和禁止种族主义组织问题，引起了缔约国的大量保留。委员会认为这一条款很重要，通过建议煽动罪包含以宗教仇恨为动机的对移民社区的攻击，或通过建议指明宗教仇恨是使情况恶化，而对第 4 条加以利用。他又说，如果仇恨演说即使在没有显示任何煽动意图的情况下也要受到惩罚的话，那么，在许多——甚至大多数——司法中，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就要被违反。

51. Thornberry 先生指出，公约是活的文书，可以将新的权利概念纳入考虑范围。在提到似乎有一种脱离“诽谤宗教”的概念的倾向时，他强调说，公约和委员会的目的都是要保护个人和社区。最后，在提到有人建议搞一个关于宗教的公约任择议定书问题时，他强调说，委员会的做法已经造成了对歧视宗教社区问题的广泛覆盖。

52. Natán Lerner 就为保护不受煽动，或鼓吹仇恨罪行之害而对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情况，和将这种限制适用于鼓吹宗教仇恨之间的类似之处和可比之处问题做了发言。¹⁴ 他强调说，在民主社会，表达自由是一项基本的权利，可受法律规定的限制。没有必要搞新的国际标准，因为公约第 19 和 20 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4 条和种族灭绝公约第 3 条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保护，并且是同表达自由一致的。

53. Lerner 先生认为，一些术语需要加以澄清，例如“不容忍”、“仇恨演说”和“敌意”等词，并建议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不妨再审查一下各自相关的一般性建议或一般性评论，以深化对法律条款的理解。Lerner 先生倾向于使用“尊重”一词，而不是反面的词，如“不容忍”。

54. Lerner 先生解释说，在处理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和法律规定的保护方面不应有区别。他主张，关于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大量的法理原则，由于这些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宗教团体可以引用针对种族主义行为的保护。他还指出，刑法有强大的教育影响，可导致对演说类型的态度的转变。但是，在区别针对宗教团体的犯罪活动与对宗教的批判这一会被看作是一种冒犯行为时，人们要小心。“诽谤宗教”是一个应加以重新审查的词，Lerner 先生建议应避免使用。

¹⁴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opinion/articles1920_iccpr/docs/experts_papers/Lerner.doc.

B. 专家讨论情况

55. 一位专家提到教科文组织建立社区媒体的经验，认为是应对主流媒体的积极方式。该专家为互联网辩护，谈到它提供的许多机会，并主张少数人不在正道上用它不应抹杀了它的好处。

56. 关于所谓“仇恨媒体”，另一位专家补充说，卢旺达的例子是，明显存在煽动暴力的情况，那并不是表达自由被利用了，而是这一自由在实际中被侵犯了。

C. 一般性讨论情况

57. 大多数观察员把表达自由描述为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解决方法的一部份；人们认为，思想的自由碰撞和不容忍的暴露应胜过禁止和新闻检查。有一种广泛的共识，即，人们更倾向于“煽动”和“歧视”的概念，而不是“诽谤宗教”的概念。认为，在国家一级重新审查和加强立法很重要，特别是关于作为诽谤者攻击对象的少数群体的答辩权问题。缺乏国家立法或国家立法不够的问题有时可通过将案子移交有能力迅速审理的区域机制来补救。

58. 一些国家表示关切说，若干国家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提倡表达自由，另一方面又颁布“否定法律”来削减在历史事件问题上的表达自由。几位发言者提到了新的国际准则的问题，倾向于澄清现有的准则，而不是拟定新的标准。

59. 有人呼吁为加强落实和保护表达自由再举行一次会议来开展后续工作。

五、会议结束

60. 在研讨会结束时，主席请专家们归纳一下自己的主要想法并就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发表意见。

61. La Rue 先生说，第 19 和 20 条所规定的限制很清楚，应照此办理。他强调通过教育加以预防和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倡记者的职业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对话和互相理解是这一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

62. Callamard 女士表示希望本次研讨会会有助于使对问题的辩论意见趋向一致。她建议开展同一性质的进一步后续活动，特别提到有必要就仇视伊斯兰的问

题展开讨论。若干问题、两极分化的复杂性和情况仍然存在；因此，一种技术性的、非政治性的环境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关于表达自由与反对歧视之间的关系问题，她建议欧洲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考虑彻底审查相关法律文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术语的必要性问题。

63. Ghanea 女士建议，在所有情况下都应采取以受害者为本的做法，以实现人人享有所有人权。她建议任何后续活动应以三个前提为基础：(a) 当民间社会而不是国家报告煽动宗教仇恨的实际事例时应采取应对行动；(b) 首先应用尽当地补救措施；(c) 现有国际机制，例如，普遍定期审议制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下的机制和国家间机制应首先用尽，然后才能考虑制定新的标准。

64. Jahangir 女士主张还需要进行磋商，特别是关于在国内一级执行现有标准的问题。她建议人权事务委员会只要认为合适就可重新审议其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0 条的一般性评论 No.11(1983)。实施特定的国家立法往往助长了两极分化而不是保护宗教少数。她建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考虑组织区域讲习班，以便在基层一级也来探讨这一问题。最后，她指出，国际人权文书是旨在保护个人和群体的。

65. Schmidt 先生建议对关于煽动宗教仇恨的区域和国际案例法进行由同侪审查的分析。他表示教科文组织决心继续关注这些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保持辩论尽可能开放和建设性很重要。

66. Amor 先生建议开展以下后续工作：(a) 编制各国立法和政策目录以发现最佳做法；(b) 再举办一次表达自由和反对不容忍问题国际协商会议，可借鉴 2001 年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容忍和不歧视方面学校教育问题马德里会议的经验；(c) 鼓励人权事务委员会考虑更新其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和 20 条的一般性评论；(d) 加强人权高专办就“通信与文化”开展工作的能力，以检测可能导致危机的紧张局势并发出警报。

67. Muntarbhorn 先生建议开展各种前瞻性的、互相尊重的对话，包括与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和媒体的协商；教派间的协商；条约机构与特别程序之间的协商；互联网上对话，包括与软件开发商和硬件制造商以及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接触；以及查明、汇编和交流交叉问题理解方案。

68. Meyer-Bisch 先生强调了多重或加重形式的歧视，例如，基于宗教、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他还着重指出了牢记歧视对于贫困的影响的重要性。

69. Eltayeb 先生强调，现有的国际准则是够用的，虽然有必要对其的解释进行审查。在这方面，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作用十分重要。此外，他表示同意将辩论从“诽谤宗教”这一概念转向“煽动宗教仇恨”这一法律概念。作为一项后续活动倡议，他建议考虑就公约第 19 条和 20 条之间的联系问题设立一个专家工作组。

70. Diène 先生重申，为面对当今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种种挑战，加强表达自由同时又尊重表达自由与其程度和限制之间的微妙平衡很重要。最后，他建议扩大目前的辩论，使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例如，政治和宗教领袖和媒体代表等。

71. Thornberry 先生指出，新的挑战正在出现，例如，在移民领域。他提出对国际准则需要有灵活的、不断演变的诠释。在这方面，关于当情况需要时由条约机构重新审议诠释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他强调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并建议，后续活动应使民间组织以及少数群体和其他相关社区参与进来。

72. Lerner 先生认为，专家研讨会显示，存在对主要概念达成共识的基础。他进一步建议，由人权高专办牵头就与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有关的立法编制一本手册。

附 件

List of experts and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Mr. Abdelfattah Amor is professor emeritu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Mr. Amor has been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since 1999, which he chaired from 2003 to 2005. He was also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from 1993 to 2004 and submitted more than 30 reports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General Assembly concerning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or belief. He is Honorary Dean of the Faculty of Legal,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of Tunis since April 1993.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Tolerance and Non-discrimination (Madrid 2001) and President of the UNESCO Priz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2000-2008).

Ms. Agnès Callamard is the current executive director of ARTICLE 19,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promoting and defen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globally. Ms. Callamard has evolved a distinguished career in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work. She has founded and led HAP International (the Humanitarian Accountability Partnership) where she oversaw field trials in Afghanistan, Cambodia and Sierra Leone and creat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lf-regulatory body for humanitarian agencies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accountability to disaster-affected populations. She is a former *Chef de Cabinet* for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as the organization's Research Policy Coordinator, she led Amnesty's work on women's human rights. Ms. Callamard has conducted human rights investigations in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in Africa,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Ms. Callamard has worked extensively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movements with the Center for Refugee Studies in Toronto. She has published broadly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women's rights, refugee movements and accountability and holds a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

Mr. Doudou Diène was born in Senegal in 1941 and holds a law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en, a doctorate in public law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a diploma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in Paris. Having joined the UNESCO Secretariat in 1977, in 1980 he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Liaison Offi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s and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s in New York. Prior to this, he had served as deputy representative of Senegal to UNESCO (1972-77) and, in that capacity, as Vice-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the African Group and Group of 77. Between 1985 and 1987, he held the posts of Deputy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or External Relations, spokesperson for the Director-General, and acting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Public Information. After a period as Project Manager of the '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 aimed at revitalizing East-West dialogue, he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Intercultural Projects in 1993 (currently Division of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 this capacity, he directed various projects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cluding the Slave Route, Routes of Faith, Routes of al-Andalus, and Iron Roads in Africa. In 1998 he was placed in charge of activities pertaining to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2002,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s Special Rapporteur on contemporary forms of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 a mandate in which he served until July 2008.

Mr. Mohamed Saeed M. Eltayeb is a human rights lawyer, scholar and consultant. He holds a Bachelor of Law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two post-graduate Diploma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nd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Hague) and two Masters Degre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nd Lund University (Sweden) respectively. He obtained his Ph.D.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from Utrecht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Mr. Eltayeb has worked, inter alia, at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SIM),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 and Faculty of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nd the Institute for Wome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the Ahfad University (Sudan). He currently works as a legal expert for the Bureau of Human Rights of the Qatar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r. Eltayeb also served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at several institut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cluding the Swiss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Lausanne, the Human Rights Centre at Essex University, the Law and Religion Program at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the Islamic Legal Studies Program at Harvard Law School and Raoul Wallenberg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at Lund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several works on human rights in Muslim countries.

Ms. Nazila Ghanea is a Lecturer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She also serves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 She was previously the MA Director and Senior Lecturer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Her publications include five book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the UN and the Bahá'ís in Iran*, 2003); articles in the journal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Human Rights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Affairs*; publications with the 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 publication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CN.4/Sub.2/AC.5/2003/WP.8). Her publications span minority rights,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women's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She is a Trustee of the One World Trust, held an OSI International Policy fellowship (2006-2007) and initiated and now serves on the bo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cus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Ms. Asma Jahangir was appointed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in July 2004. In this function she has submitted several reports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Previously she had already served as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from 1998 to 2004. In her two mandates she has conducted a total of 22 country visits. Presently, she is also Commissio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nd Chairpers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Pakistan. In her home country Pakistan she is Director of AGHS Legal Aid Cell, a NGO set up in 1980 to provide free legal aid to women. Over the years, the mandate of AGHS has expanded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a growing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mands made by various groups for legal recourse. Ms. Jahangir represents clients in the High Court, Federal Shariat Court and the Supreme Court of Pakistan.

Mr. Frank La Rue has worked on human rights for the past 25 years. 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Center for Legal Action for Human Rights (CALDH), both in Washington DC and Guatemala, which became the first Guatemalan NGO to bring case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o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CALDH was also the first Guatemalan NGO to promot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Mr. La Rue also brought the first genocide case against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in Guatemala. As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his name was presented to the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 in 2004. Mr. La Rue has previously served as a Presidential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n Guatemala, as a Human Rights Adviser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Guatemala, as President of the Governing Board of the Centro-Ame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Democracy Studies and as a consultant to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Mr. La Rue holds a B.A. in Legal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Guatemala and a postgraduate degree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r. Natán Lerner was born in Poland and educated in Argentina, where he obtained his law degree in 1950 and his doctorate in Law and Social Sciences in 1958, both from Buenos Aires University. He was a practicing lawyer in Buenos Aires until 1963. From 1963 to 1966 he worked in New York for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In Israel since 1966, he was director of the Israeli office of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until 1983. From 1984 to 1989 he was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of Jewish Civilization. Simultaneously, he taught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Since 1989 his main activity is university teaching. Since his retirement from Tel Aviv University,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he teaches at the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Herzliya. His main course is International Law and he also conducts seminars on State and Religi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Minorities, and Genocide. Mr. Lerner is the author of the following books in English: *Religion, Secular Beliefs and Human Rights* (Leiden, 2006); *Religion, Belief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ew York, 2000); *Group Rights and Discri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2003);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lphen an den Rijn, 1980); *The Crime of Incitement to Group Hatred* (New York, 1965). He also published several books in Spanish. He is the author of many articles in Spanish, English and Hebrew, published in books and journals of Israel, the USA, Spain, Argentina and other countries.

Mr. Patrice Meyer-Bisch is coordinator of the *Institut interdisciplinaire d'éthique et des droits de l'homme* and of the *Chaire UNESCO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 et la démocratie* at the University of Fribourg, Switzerland. Born in 1950, Mr. Meyer-Bisch studied in Nancy, Fribourg and Paris, and obtained his Ph.D. in Philosoph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Fribourg. Mr. Meyer-Bisch is very active in various fields of research, conducting in particular studies on cultural rights, the ethics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human rights, the theory of subject and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and pluridisciplinarity, and cultural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

Mr. Vitit Muntarbhorn is a Professor of Law at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He has served in various capacitie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rom 1990 to 1994, he wa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and since 2004 he i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He was awarded the 2004 UNESCO Priz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diverse activities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in favour of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all human rights for all.

Mr. Bertrand Ramcharan (Chairperson of the expert seminar) was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nd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when Mr. Sergio Vieira de Mello, then High Commissioner, was killed on 19 August 2003 during the attack on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Baghdad. Mr. Ramcharan then assumed the post of acting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which he held until July 2004. During his three decade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Mr. Ramcharan served in the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s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Director, as the Secretary-General's Chief Speechwriter, as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UNPROFOR, the largest-ever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 as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ormer Yugoslavia, as political adviser to the peace negotiators in the Yugoslav conflict, and as a Director in the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Department, focusing on conflicts in Africa. A barrister of Lincoln's Inn, with a Doctorate in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arned in 1973, Mr. Ramcharan was a Commissio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from 1991 to 1998 and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since 1996. He was Adjunct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has written or edited some twenty books and numerous articles. He holds the Diploma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where he has also been Director of Studies.

Mr. Mogens Schmidt is Deputy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Democracy and Peace at UNESCO since 2003. At UNESCO h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in post conflict and post disaster environments. Born in Denmark in 1950, Mr. Schmidt has since 1974 been active as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Aarhus, Denmark, Director of the Danish School of Journalism,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and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Paris (France). Mr. Schmidt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with research,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of media development programmes from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Mr. Patrick Thornberry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Keele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and a Fellow of Kellogg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Mr. Thornberry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 since 2001 and was rapporteur of that Committee from 2002 until spring 2008. He currently chairs the Early Warning and Urgent Action Group in CERD, dealing with a range of pressing situations notably including land and resource questions involving indigenous peoples. He is a former Chairman of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and has acted as consultant and adviser to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r. Thornberry is the author of numerous works in the field of minority rights,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notabl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Indigenous Peoples and Human Righ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with M.A. Martin Estebanez) *Minority Rights in Europe*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2004).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commentary f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o be published in 2010.

-- -- -- -- --